

文明互鉴视阈下林纾的三种身份考读

栾丽梅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基础课教学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 林纾作为清末民初的文学巨擘,集“文言文捍卫者”“传统文化殉道者”“外国小说译介者”三种身份于一体。作为文言文捍卫者,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力排众议,用铮铮铁骨竭力捍卫文言文固有的地位,提倡古文与白话文并行,骈散结合、言畅意美。作为传统文化殉道者,他的好义尚侠、家风严谨、学养深厚,凝聚了五千年中华文明传统美德。作为外国小说译介者,他在国运多舛之际,通过大量翻译小说达到警醒国人、救国保种之目的。林纾作品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他是清末民初一位对文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化狂生、译界泰斗。他既坚守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又主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其文明互鉴理念对当代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划时代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林纾; 传统文化; 林译小说; 三种身份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4)02-0122-06

Reassessment on Lin Shu' three ident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LUAN Limei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Hebei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As a famous literary gia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Lin Shu had three identities: “defender of classical Chinese”, “marty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or of foreign novels”. As a defender of classical Chinese, Lin Shu tried his best to defend the inherent status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dvocating that ancient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and can go hand in hand. As a marty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e was a righteous and chivalrous man, with a rigorous family style and profound education, and embodied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 translator of foreign novels, he translated a large number of novel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lerting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aving the country and preserving spiritual seeds. Lin Shu's works highlighted the diverse charm of Chinese culture. He was a cultural fanatic and translator wh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circle. He not only adhered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took the initiative to translate Western literary works. His concept of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has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Keywords: Lin Shu; traditional culture; novels translated by Lin Shu; three identities

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清末民初文坛开山祖师之一,著名文学家、诗人、书画家、译界泰斗。林纾以坚定的信念守护传统文化的根脉,他的作品不仅体现了对古文的精湛

造诣,中西方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也在他的笔端展现。他所呈现出的异质文明革新与传承并存,为后人汲取传统文化智慧、塑造宽厚品格、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明互鉴提供了重要参照。在全球化

收稿日期:2023-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YY038);2021—202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21JY005)

作者简介:栾丽梅(1983—),女,河北石家庄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浪潮的冲击下,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并行的时代,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重温林纾作品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

中外文学史上对林纾的评价呈二元对立态势。梁启超曾评价林纾译作虽风行于时,所选译本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并在视选学为“妖孽”的新文化运动中将其归入“谬种”桐城派,颇具贬抑之词。^[1]然而就在林纾逝世次月,郑振铎指出历史对林纾的评价有失公允,他认为林纾对中国文坛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强调他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不予以记载的重要人物。^[2]上述两种迥异的观点在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林纾不识外文,却与严复齐名,正如康有为在赠林纾的赋谢诗中所言“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民国时期新民图书馆创始人之一的钱笙南在为《然藜奇彩录》作序时称“一时泰斗,惟林畏庐一人,余子碌碌曷足比数”。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这一凄美的爱情小说激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翻译家严复在阅读林纾译本后赋诗“尽有高词媲汉始,更搜重译绩虞初”^[3]。桐城派的代表人物马其昶、现当代文学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胡适、郑振铎、叶圣陶、冰心、沈从文等无一例外都将林纾视为文学界名噪一时的中流砥柱。周作人认为近代文人中林纾对鲁迅的影响在当时仅次于梁启超和严复。他和鲁迅在东京留学之际,林译小说每印出一册,他们必定买来并改装为硬质材质的书皮,仔细阅读并悉心留存。茅盾曾评价林译小说很有风趣,他既佩服又感惊奇。胡适也意识到林纾对白话诗并非完全排斥,他说“我们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过很通俗的白话诗”^[4]。掌握九国语言的末代狂儒辜鸿铭对外尊称林纾为“大师”。阿英认为林纾“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从而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5]。郭沫若嗜读林纾作品,认为林纾的异域文学对他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将林纾与梁启超作比,认为他们是文化批评领域相当有建树的人物。冰心幼年时如痴如醉地阅读林纾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开启了她西方小说的阅读之路。

著名文学理论家王东风表示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之外,林纾对中国文化的诗学影响更堪称是划时代的。^[6]张俊才、李景光、罗选民、罗志田等学者将林纾的创作与文化传播、文化调和、社会改良相关联,其中以张俊才的《徘徊在“共和老民”与“大清举人”之间》《林纾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为代表,字里行间反复铺陈林纾对“共和”“新政”“文化”的失望。陈恩虎将林纾的文章归入前清遗老群体作品加以分析,杨联芬将现代性的发展与林译小说相关联。而黄汉平、韩洪举、孙会军、邵璐则把误读、翻译社会学、归化异化等理论与林译小说进行结合,探索其译作特色。与此同时,杨红军、姚艳波、祝朝伟对林纾本人及其作品的解读也独树一帜。20世纪80年代薛绥之主编的《林纾研究资料》,21世纪初福建文史馆出版的《林纾研究资料选编》,商务印书馆整理的《林纾家书》等权威林纾研究著作,也为世人了解林纾提供了宝贵资料。

倘若从二元对立的思维中摆脱出来,林纾是一位被严重低估了的中华传统文化捍卫者和外国文学传播者。值林纾先生逝世百年祭之际,本文基于上述学界对其评价的不同视角,试图从林纾作为文言文捍卫者、传统文化殉道者、西洋小说译介者三个维度全方位立体地对其身份进行辩证考论,从而再度走近这位文化狂生,力图矫正新文化运动历史上个别对其有失偏颇的评论,为中西文明互鉴提供更多参照。

一、“铮铮铁骨”——作为文言文捍卫者的林纾

“古文不宜废”是林纾与新文化阵营对峙期间一贯秉持的立场。20世纪初一批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1915年创刊,原名为《青年杂志》)为载体,以北京大学为阵地,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彼时的林纾曲高和寡,是在新旧文化夹缝中坚持自己主张的守旧派老先生形象,他在短篇小说《妖梦》中影射蔡元培,继而想达到攻击新文化的目的,而蔡元培不计前嫌,亲笔致信林纾,请他为刘应秋的遗著作序。蔡元培的恳切陈词令林纾感动,他自惭形秽道“我视他为妖孽,他却奉我为大贤”。两相对比,林纾便不顾巨额违约金和补偿金,决定不再

刊发《荆生》《妖梦》。在这位颇具风骨的文人看来,金钱事小、人格事大。之后林纾因张厚载私发《妖梦》而与其决裂,这一事件为史实所载,也从侧面体现了林纾好义尚侠、为人坦荡、不为名利所左右。

由于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林纾被胡适、罗家伦、刘半农等人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守旧派代表人物,双方关系一度非常紧张。1917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中,针对林纾恪守古文的思想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同年,胡适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再次提出琴南先生“嗜古者之痼也”。刘半农在其《复王敬轩书》中极尽贬低林纾才华之能事。维新派视林纾等人为方枘圆凿,水火不容。在之后林纾与推崇学术自由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书信往来中不难发现,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文学革命派被北大免职与林纾不无关系。面对如此笔伐,林纾明确表示希望在新文学蓬勃发展的同时,绝不能“捐弃故纸”。1919年3月18日他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啾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落款“林纾顿首”,字里行间情真意切,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蔡元培回信后,林纾又在《公言报》《新申报》《大公报》连续发文对自己的过激言论致歉。即便是与主张使用白话文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文化立场不同,他作为传统文化阵营的领军人物,也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在扬弃大潮中竭力保留文言文的地位。

林纾出生于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的福州,这里社会矛盾集中,文杰辈出。他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国人思想之开化打开了一扇窗口。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已过花甲之年的琴南先生对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置之不理,却在担心“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损其旧”“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亡,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7]。这里林纾提到的“东人”正是从陆心源后人处购买藏书的日本人。陆心源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藏书15万册。1907年日本静嘉堂从陆

树藩(陆心源之子)处斥资25万两购买藏书。林纾担心这些藏书落入日本人手中,而商务印书馆当时的社长夏瑞芳听取了林纾的建议准备了8万元用于购买这些书目,这对于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商务印书馆而言是笔巨款。

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冲突中,林纾作为旧文化阵营中的执牛耳者,发表《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认为白话文“颠孔孟,铲伦常”。他虽信奉孔孟程朱,但提倡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并行不悖。作为古文大家,他非但没有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迷失,反而以“晨鸡”自比,义正辞严地反驳白话文运动中胡适将白话文学作为中华文学之宗的言论^[8],并在1919年2月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古文之不宜废的理由,担忧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亡,批评新学家们“未得其新,而先殒其旧”。随后胡适于1919年5月1日在《新青年》再次树起了文学改良的大旗,宣扬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言论,引发陈独秀等人在文学界的学术激辩。作为文言文坚定的捍卫者,林纾在病榻上依旧为其四子林琮留下了“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所宝”的遗训。林纾守护的不仅仅是古文这一文化的载体,而更是传统礼教道德和由此带来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教化功能。其文言文功底深厚,文学色彩浓郁,既有古雅之风,又不失内涵与修辞手法,在悠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林纾以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文学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文字如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智慧与情感的光芒,成为不朽的文化瑰宝。

二、“文化狂生”——作为传统文化殉道者的林纾

林纾不仅坚定地捍卫文言文的主体地位,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颇有造诣。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学自幼怀有赤子一般的深厚挚爱之情。^[9]他自幼师从薛则柯、朱韦如等勤奋苦读,家虽贫寒但依然喜好收藏古书,16岁时已有三橱藏书。《左传》《史记》《尚书》等都是他反复诵读的经典著作。“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是其座右铭。他创作的诗歌(集)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等,散文《畏庐文集》以游记、义理、赠友人等为主题,文采斐然。受师傅薛则柯影响,他潜心研究杜

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古文作品,编纂《韩柳文研究法》《文法讲义》《春觉斋论文》《左传撷华》等文论,骈散结合、刚健雄直,发表了《官场新现形记》《剑胆录》《京华碧血录》《金陵秋》等小说,以爱情为纬,以国事为经,雅俗共赏。他的时评文章收录在1924年商务印书馆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嘉祐集》《淮海集》《后山文集》中,其中选取的《祭任氏姊女》《祭亡妻文》多篇文章都与女性有关,可见林纾的思想并不封闭僵化。早在1897年梁启超提出兴建女子学堂之时,林纾就写出了《兴女学》新乐府诗,其中“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语儿怀心头”的诗句,指出了女性受教育对国家和民族兴亡的重要作用。在反映晚清文学思想变化的权威文学资料《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林纾作品占比近三成,权重排名第一,其中收录的《红礁画桨录·序》(1906)倡议“倡女权,兴女学,大纲也”^[10]。由此可知,林纾并非顽固不化之流,其批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腐言论发生在康有为上书之前,而他后期提出的多项提议都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女性接受教育这一倡议得到政府的支持,次年(1907),政府发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辗转确立了女子学堂存在的必然性,这一进步与林纾等人的一贯努力密不可分。

林纾诸多文集乃至其墓碑都以“畏庐”命名,这源于祖母自幼教育他“畏天循分”。他恪守这一祖训,将传统的伦理纲常、仁义孝道奉为经典。林纾的外祖母及母亲也都是德行醇厚之人,外祖母曾教育林纾及其弟兄“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11]。林母宽以待人,待其叔父遗孤胜于自己儿女。林纾受母亲影响,乐善好施,生平多义士之举,在七十岁寿诗中写道:“四十年来,连为亲友鞠孤儿七八。十年来屡得乞米之帖,余皆应。以四十年计,余所靡者已万金矣。”^[12]林纾对晚辈的教育也恪守仁义孝道,在给儿子林琮的家书中,鼓励他要常怀敬畏之心,做顶天立地的男子,在给女儿林璐的家书中叮嘱她要忠厚诚实待人。《先妣事略》《畏庐文集之谒外大母郑太孺人墓记》等作品也是他至情至善的佐证。

林纾以晚清遗老自居,支持立宪制,是地道的保皇派。他的书斋取名“望瀛楼”是由于光绪帝曾经被囚禁在瀛台十年,“望瀛”是他对逝去的光

绪皇帝乃至清王朝的怀念之情。随着英、法、俄肆意攫取中国领土和白银,列强的大规模侵略使山河凋敝,1884年发生在福建的甲申中法海战使林纾初次意识到国家深陷泥潭。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惨败加重了民族的灾难,1898年国难当头,林纾上书御史台抗议德军的入侵。“余之译此,冀天下之尚武也。”^[13]林纾晚年是保守的立宪派,在《畏庐诗存·自序》中写道“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余心”。《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明确表示拥护君主立宪。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为其好友,1898年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林旭由于向慈禧力荐保留光绪而不幸遇难。对此林纾大受触动,决议从改良的角度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如《徐景颜传》暗含对民族存亡的深深担忧和对忠义之士悲惨结局的痛惜之情,《闽中新乐府·国仇》“我念国仇泣成血,敢有妄言天地灭”之句充溢着感天动地的民族气节。《论中国丝茶之业》《论中国海军》这些时评则体现了林纾作为文人对国家实业和军事的关注与担忧。林纾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还体现在1912—1913年间他在《平报》上频繁发表文章谈论市政动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其《议员打议员》《本席脑筋乱》《响一声》《买投票》《美人得选举》等短文为百姓争相传阅。由上可知,林纾虽屡遭诟病,然而他却珍视中华传统文化,痛心于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并以文人之如椽巨笔发挥作用。

三、“译坛泰斗”——作为外国小说译介者的林纾

于林纾而言,西方文化在走进中国的初期犹如一记惊雷,然而他并未囿于传统文化的框架故步自封,虽然不通外文,却能开译介之先河。他通过与魏易、王寿昌、曾宗巩等人合作,以“耳受手追”^[14]的方式译著184部(此数量为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后记中马泰来所统计,含1912.12—1913.09《平报》上以“畏庐”为名的译文),涉及11个国家的117位作家。其中不乏莎士比亚、司各特、哈葛德、雨果、欧文、狄更斯、巴尔扎克、大小仲马、塞万提斯、托尔斯泰、易卜生、柯南道尔等欧美诸国文学大师,创造了中华文学译书史上一座至今无法逾越的高峰,他是当之无愧的“译界之王”。在中国翻译史上,林纾由于使用桐城派古

文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作品数量多、质量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和译界一位泰斗级的人物。

清末民初,林纾帮助学生林长民创办了翻译类杂志《译林》,使之成为中国文人看世界的一面窗口。他在《译林》(1901年1月)序言中提出:“欲开民智,必立学堂……今日神京不守……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这也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林译小说的流行具有时代的必然性。马祖毅将林纾的翻译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两个时期,辛亥革命前译作五十余种,十之八九译得不错,精神饱满而又集中。^[15]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说部丛书”外国小说翻译系列322部单行本中,林译小说占据半壁江山,共计刊印147部,由于好评如潮、格外畅销,商务印书馆又单独刊发了“林译小说丛书”百余部。光绪壬午年,林纾高中举人,同期中举的还有与张元济私交甚好的高凤歧,其为1902年加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之胞兄。高梦旦1903年始先后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国文部、出版部部长等职,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林译小说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纾翻译的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欧美小说,典型译作如莎士比亚《吟边燕语》、司各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剑底鸳鸯》和《十字军英雄记》等。其中,《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百余年来倍受关注,其研究者多以民族性和意识形态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林纾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提倡通过译作引入西学更多是出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考量。周作人指出:“《茶花女》固然也译得不差,但是使得我们读了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司各特 Walter Scott 的不同译法)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被看重了。”^[16]他曾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中写道:“此书果令黄种人读之,亦足生畏惕之心,此又一妙也。”郭沫若认为:“林译小说中对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影响的,是司各特的 *Ivanhoe* (《艾凡赫》),他译成《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像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17]茅盾《子夜》叙事架构也是借鉴了林纾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撒克逊劫后英雄略》1905年在商务印书馆刊发,1906年经沈雁冰校注释,即与林纾本

人的《韩柳文研究法》、谢无量的《诗经研究》《平民文学》、何仲英的《中国文字学大纲》、梁任公的《陶渊明》、张之纯的《文字源流》等一并被采纳为当时高级中学的教材,成为西洋文学进入国人语文教材的肇始,也成为了当时国人与西洋小说距离最近的一种路径。

在20世纪30年代波谲云诡的局势中,以“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为标准创办的《现代》刊物,载文评价林纾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译本“对于近世文化的意义,是决不下于《天演论》和《原富》的……直接或间接地催促我们走上了文学革命的上去,直接或间接地奠定了我国欧化文学的基础”^[18]。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嬗变期,在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下,在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激起的民愤中,《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引起巨大轰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随后谢煌、施蛰存、陈原等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改译也从侧面反映了这部译作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他还在《吟边燕语·序》中写道:“英人固以新为政也,而不废莎氏之诗。余新译莎诗纪事,或不为新学家之所屏胡乎?”^[19]林纾“警醒国人,救国保种”译介思想对整个清末民初文学界和思想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林纾还大胆翻译《剑底鸳鸯》《迦因小传》等言情题材小说,这使他的译本读者数量大大增加,也在反抗封建保守主义的道路上进一步推动了国民的思想开化。林纾在他译文的序和跋等副文本中也多次写道“不必心醉西方,谓欧人尽胜于亚”^{[20]349}、“勤求新学,只为振作士气,爱国保种”^{[20]44},诸如此类不多列举。总之,林纾在辛亥革命前的五十余部译作中所附的“序”和“跋”大都体现了他的爱国热情和维新的愿望。可见林纾并不抱残守缺、封闭自己,他认为一些国家特别注重发展政教、强国富民,在无外敌入侵之虞的情况下,方有闲暇以文学家的作品来赏心悦目、自得其乐,他认为国运衰败与政治教育、社会发展有关,与喜爱“思想之旧”“好言神怪”的文学作品无涉。^[21]林纾的这些翻译思想是建立在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的,他的译作对社会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与严复、梁启超、苏曼殊等人的译作形成合力,开拓了国民视野,冲击了传统落后的封

建思想,推动了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而其译本作为文学作品,在《孝女耐儿传·序》《黑奴吁天录·例言》《鬼山狼侠传·附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中都有涉及中西小说体例的差异。此外,林纾在词汇的选择和句法的运用方面大胆创新,对汉语的革新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结束语

立足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用嬗变的、动态的眼光重读林纾,不难发现在中国文学从蒙昧走向开明的窗口期,林纾提倡古文与白话文并行,传承古文这一几千年中华文化积淀的载体。他的文风简洁古雅,形式上突破了章回体小说的局限,

加快了小说在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他通过小说翻译,打通了中西方文学壁垒,对清末民初小说这一主流文学形式的革新功不可没,他的创作对新文学也具有启蒙意义。事实上,鲁迅、胡适、梁实秋等近现代文学家的白话文并未使林纾的文言文相形见绌,相反,郭沫若等多位文学巨匠在创作时对其作品和译文进行了借鉴。在中外翻译史的潮汐中,他的译作既体现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热爱,又拓宽了民众国际视野,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西方先进思想的引入,是中西方文明互鉴的时代映射。研究林纾其人及其著作,对永葆传统文化活力、发扬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多元化张力、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鲜明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8.
- [2] 郑振铎. 林琴南先生[J]. 小说月报,1925(11):14.
- [3] 许祖华. 严复作品精选[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275.
- [4]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 北京:中华书局,1993:461.
- [5] 阿英. 晚清小说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2.
- [6] 王东风. 林纾译《李迫大梦》片段赏析[J]. 中国翻译,2011,32(2):42-49.
- [7] 林纾. 论古文之不宜废[J]. 民国日报,1917-02-08(2).
- [8] 林纾. 论白话文之消长[J]. 文艺丛报,1919(4):3.
- [9] 苏建新. 为古老民族的文化守护神林纾一辩[J].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7,5(5):409-412,429.
- [10] 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0:226-227.
- [11] 朱羲胄. 林畏庐先生年谱:卷一[M]. 上海:世界书局,1948:3.
- [12] 朱羲胄. 林畏庐先生年谱:卷二[M]. 上海:世界书局,1949:47.
- [13] 林纾. 剑底鸳鸯[M]//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75-177.
- [14] 张俊才. 林纾评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 [15] 马祖毅. 林纾与文学翻译[J]. 翻译通讯,1981(6):36-37.
- [16] 周启明. 鲁迅的青年时代[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78-79.
- [17] 郭沫若. 沫若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14.
- [18] 凌昌言. 司各特逝世百年祭[J]. 现代,1932(2):276-277.
- [19] 林纾. 吟边燕语[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33.
- [20] 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21] 李伟昉. 论林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及其文化意义[J]. 文学评论,2016(1):31-35.

(责任编辑:王圆圆)